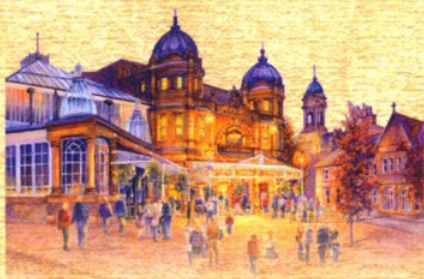


鼎新北科外语学者丛书



论荷马史诗的翻译

[英] 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著

张翠玲 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论荷马史诗的翻译

LUN HEMASHISHI DE FANYI

鼎新北科外语学者丛书

- 《牛津英语词典》与众源编纂模式
- 中国学习者英语称赞类动词公式语输入研究
- 汉语照应省略的类型逻辑研究
- 英语心理过程小句中的隐喻研究
- 社会变迁与共和国同龄人的生命历程
- 拜厄特四部曲中的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化运动
- 论荷马史诗的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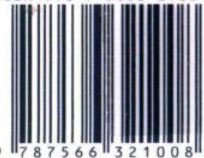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董黛

助理编辑：郭玉红

责任印制：沈德军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ISBN 978-7-5663-2100-8



9 787566 321008 >

定价：30.00元

鼎新北科外语学者丛书

论荷马史诗的翻译

〔英〕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著

张翠玲 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荷马史诗的翻译 / (英) 马修·阿诺德著; 张翠玲译.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9.11
(鼎新北科外语学者丛书)
ISBN 978-7-5663-2100-8

I. ①论… II. ①马…②张… III. ①《荷马史诗》
—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545.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35888 号

© 2019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论荷马史诗的翻译

[英] 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著

张翠玲 译

责任编辑: 董黛

助理编辑: 郭玉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5.5 印张 76 千字

201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2100-8

定价: 30.00 元

本书为北京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编号为 **FRF-BR-18-010A**）和 2018 年度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项目“全球化视域下 MTI 翻译理论课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为 **MTIJZW201801**）资助项目

总 序

AI时代加速到来，外语学者仿佛走到绝壁悬崖，纷纷探寻出路。

我们坚持的是，提倡人文，坚持鼎新。智能时代固然无法抗拒，但科技无法给予人性的温度，无法产生人文的光辉。唯有与人声相应、与文气相通，才能共生未来。因而，外语学者必须是人文的、人性的、人味的。他们应以独特的个体思考，“标新理于众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最终，从人文出发，达于鼎新之境，立于不被时代淘汰的先声之地。

奉人文鼎新为圭臬，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砥砺前行、蓬勃发展。2006年获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11年获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已成为本硕博齐全、特色明晰、规模适度、注重质量、在国内具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外语人才培养单位和研究单位。纵观英、日、德三个语言文学学科，无不以“人文”思想贯之，展现了解放思想、力求突破的鼎新理念。

人文教育关心人类的终极目标。它不仅关注人类的人性和命运，也关注人类境况的不同和统一。本套丛书就是这一人文思想的结晶，该丛书囊括了英语、日语和德语世界的多维度研究成果。凭栏静听，世界各国皆有所思；沧海横流，英雄各路方显本色。这些著作有助于我们认知人类知识多样的呈现方式，探索人类命运的整体性和同一性，如此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我们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鼎新理念乃北科外语学者之教研风尚，催生了新一代之学术思想——求知更要求智，蜕故更要孳新。这套丛书无疑是这一学术思想的最佳体现，皆

2 论荷马史诗的翻译

为我院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近年来最新的探索之作。事实上，人文鼎新之于我们，不仅仅是理念，不仅代表一种客观的知识，告诉我们“是什么”；更重要的，它还是一种实践，让我们学会如何辨认、形成和追问种种价值性的问题，去探寻“为什么”和“应该怎么做”。唯有如此，才能从“求知”上升到更高一层的“求智”，在 AI 时代重返“挚爱真善美，关切天地人”的精神家园。

春江水暖，鼎新者当作先知；继往开来，人文者当为人先。让我们共勉。

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9 年 4 月

译者前言

在西方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吟游诗人，歌德承认，此人的作品使他每天受到教益；雪莱认为，在表现真理、和谐、持续的宏伟形象和令人满意的完整性方面，此人的功力胜过莎士比亚（转引自陈中梅，2018：1）。他为世界文学宝库贡献了两部千古史诗《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他就是古希腊诗人荷马。这两部史诗是西方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是西方艺术上的一座巅峰。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取材于古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的起因是特洛伊王子抢走了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海伦，战争持续了十年。荷马没有描述战争的全过程，而是围绕战争第十年的最后几十天展开叙述。《伊利亚特》全篇以希腊英雄阿基琉斯的愤怒为线索组织材料，构思精巧，叙述角度奇特。《奥德赛》则讲述了希腊战将奥德修斯在战争结束后返回希腊故乡的故事。

荷马史诗大约从16世纪开始被译介到英国，随后各种译本迭出。其中，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的译本（1611）和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译本（1715-1720）都曾引起巨大的反响和轰动，查普曼的译文曾让大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深深陶醉，当即创作了著名的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蒲柏的译文采用英雄双行体，每两行一韵，优美、精致、工整，被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评价为“世界上最高贵的诗歌版本”（约翰逊，1826：224），约翰逊认为他翻译的《伊利亚特》“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无法匹敌的翻译成就”（同上：292），他的译文大卖，从此衣食无忧，得以成为职业作家。荷马史诗的英译，在19世纪中期达到一个小高峰，当时有两本

全新的《伊利亚特》英译本问世，分别是纽曼（F.W. Newman）的译本和赖特（Ichabod Charles Wright）的译本。因为 19 世纪的英国，翻译活动空前繁荣，翻译不仅受到重视，也被看作严肃的学术活动，很多学术期刊常常刊登最新译出的评论文章，探讨各种文体的翻译方法。对于当时的英国知识界来说，荷马史诗似乎比之前任何时代都重要。这么多新旧译本良莠不齐，该如何正确地翻译荷马成为英国知识界最关注的重要问题，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一场论战。论战的发起者是批评家马修·阿诺德，他于 1861 年在牛津连做三场演讲，对荷马史诗的几部英译本进行了批评，纽曼随即进行了反驳，撰写《荷马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答阿诺德》（*Homeric Transl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ply to Mathew Arnold*）一文，阿诺德应战，做第四场演讲“最后的话”，论战结束。

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的诗人兼批评家，在诗歌创作和批评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 19 世纪的英国评论界独领风骚，其“思想雄大高峻，且富于雅趣”（李叔同，2015：203），他是英国学术批评的开拓者，也是 20 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奠基人。他的主要作品包括《文化与无政府主义》（*Culture and Anarchy*）《批评文集》（*Essay in Criticism*）等。

阿诺德的这三篇演讲稿于同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书名为 *On Translation Homer*。虽然是翻译评论文章，但阿诺德提出的翻译思想是开创性的。例如，他认为评价荷马译文的标准应该是译文的总体效果，而不是某些措词和句法的优美与否，这在 19 世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翻译理念。他的思想和判断也影响了不少后来的翻译批评家和翻译理论家。钱钟书于 1934 年写过一篇《论不隔》，称该文即是受到阿诺德在 *On Translation Homer* 中引用的柯勒律治的两句诗的启发：“偶然重新翻开马太·安诺德的《译荷马论》（*On Translating Homer*），意外的来了一个小发现。试看下面意译的一节。‘枯儿立治（Coleridge）曾说过，神和人的融合，须要这样才成——

这迷雾，障隔着人和神，
消溶为一片纯洁的空明。’”

刘重德（1984）曾“扼要介绍”过阿诺德的这三篇演讲稿，他当时误称 *On*

Translating Homer 是阿诺德的一篇文章。

阿诺德在文中旁征博引，纵论翻译，探讨了诸如翻译的目的、翻译的风格、语言对等、忠实、格律等问题。这些探讨，在当时具有开创性，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阿诺德指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完美的英译本，它们都漏掉了一个或多个荷马史诗特征。他主要批评了古柏(William Cowper)、蒲柏、查普曼和纽曼的英译本，这四个译本在当时的英国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第一篇里，阿诺德主要批评了古柏、蒲柏和查普曼的译文，称他们都未能成功地翻译出荷马史诗的风格，虽然译文很美，但都不是荷马。在第二篇，他主要批评了纽曼和查普曼的译文，指出二者的译文在句法、措辞和风格上都与真正的荷马史诗相去甚远。荷马史诗用六步格的格律写成，不用尾韵，但希腊语本身的重弱音明显，读起来铿锵感更强。将荷马史诗翻译成英语，应该采用什么音步格律？该不该用韵？这是阿诺德在第三篇中提出的问题。在他所批评的四部译文中，古柏和纽曼的译文均未用韵，蒲柏使用的是英雄双行体，两行一韵。阿诺德基于对原文风格的分析提出六步格的无韵诗最能展现荷马史诗的真正风格，是翻译荷马的最佳诗体，并将自己提出的翻译标准和方法用于实践，翻译出两段译文与其他译文做对比，以证明这种翻译方法能再现荷马史诗的总体效果，证明他为译者提出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

阿诺德的这三篇演讲稿不仅在翻译学界影响深远，在文学批评界的影响也举足轻重。阿诺德在纵论翻译之外，还对荷马史诗以及众多其他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进行了评价，他总结的荷马史诗的四个特征——迅捷、风格的平易和直接、思想表达的平易和直接、高贵——已成为评价荷马史诗的圭臬，陈中梅(2018: 1)就在《伊利亚特》中译本的序言中引用了阿诺德的评价。

笔者现将这本经典完整译成中文，希望对翻译爱好者以及古希腊文学、荷马史诗的爱好者有所助益。在翻译研究突飞猛进的今天，虽然书中的有些观点看起来有些过时，但瑕不掩瑜，了解历史、以史为鉴、批判性的阅读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在动笔翻译之前，笔者做了大量的功课，包括阅读各种关于荷马史诗

的评论、译本评论等。其中，最令我着迷的是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阅读。荷马史诗之魅力，以前不知，今一开卷，便欲罢不能。荷马史诗恢宏的气质、细腻的描写、动人的情节，让人爱不释手。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困难重重。首先，阿诺德引用了很多希腊原文，为了搞清楚希腊原文的真正意思，笔者花费了很大精力；其次，阿诺德提到了众多古典作家、诗人并引用了他们的作品，为了了解这些作品，笔者花费了大量时间。

19世纪中期，欧洲文学盛行演讲体、辩论体、小册子等，因而这些演讲体就是当时的文学作品。因此，笔者将原文看作正式的文学作品，在翻译中尽量采用书面语，避免使用口语化的语言。原文中的希腊语，如果是为了和英译文对比，笔者即予以保留，以方便懂希腊语的读者阅读和欣赏；如果是其他情况，笔者则将其直译成汉语。同样，英文的诗句，如果是为了分析英文的格律与风格等，笔者也予以保留。有些诗句，笔者或附上名家的汉语译文或将其直译成汉语，目的也是为了让读者弄清楚这样的诗句缘何会遭到阿诺德的批评。

由于原文最初是作演讲稿用，所以作者在人物前面加了“先生”或“教授”等称呼，在翻译时，大部分情况下为简洁起见笔者都将其省略，只称其名。另外，原书的脚注采用的是星号（*）和剑号（†），译文统一采用数字形式标注，以方便读者。

在本书的最后，笔者附上了阿诺德所批评的四个《伊利亚特》英译本以及陈中梅前后两个汉译本的第一段，以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阿诺德的批评。

最后，感谢北京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经典学术翻译项目，让我有机会翻译阿诺德的这三篇演讲，于我而言，收获的不仅是翻译理论认识的提高，更是翻译过程中的快乐以及了解并阅读荷马及其史诗的快乐。

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郭玉红编辑，她认真又细心，对本书的体例、注释等给予了非常详细的指导。

张翠玲

2019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讲	1
第二讲	21
第三讲	45
参考文献	71
附录	72

第一讲

有人不止一次地建议我翻译荷马的史诗，这于我而言，是一个既没有时间去完成也没有勇气去承担的任务。不过，这个建议却让我更近距离地重新审视这位我长期研究的诗人，我最近一两年一直在阅读荷马的作品。虽然古典文学研究可能日益衰落，但不论这种研究的未来如何，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随着课堂讲授和读者数量的增加，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荷马的作品，把它当作诗歌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作品，而不是古典文学课程的一部分。最近十年，英国出现了两本全新的《伊利亚特》英译本，一本是博学多才的纽曼教授所翻；另一本是由曾经呕心沥血翻译但丁《神曲》的赖特所译。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这两部最新译作都不是荷马作品的模范译本；未来还会有其他译者尝试翻译荷马史诗。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指出前人翻译中的纰漏以及翻译荷马的译者应该关注的重点，来为后来的译者提供一些指导，帮助他们节省时间和精力。

关于译者在翻译时要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在这个最初级的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性意见。一方认为，翻译应该是“让读者忘记他读的是翻译，完全进入一个假象，认为自己是在阅读原作”，如果翻译成英语的话，就像是“在阅读一个英国人写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原作，据说会“被看作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译成能像原作影响希腊的自然听众一样影响我们的英语同胞的诗歌。”另一方，比如纽曼批评了前面的观点，宣称他的“翻译目的恰恰相反，他要保留原作的每一个特别之处，尽最大可能保存原作的异化特征”，以便读者“永远记得他是在用不同的材料模仿原作。”纽曼说，译者的“第一责任是忠实”。或许，对这一点双方都没有异议，但问题在于，忠实的含义是什么？

2 论荷马史诗的翻译

我的目标之一，就是给译者提出比较实际的建议。我不会讲太多理论的东西，但我建议译者不要试图“以《伊利亚特》为基础，按照它对希腊自然听众的影响将它译成能对英国人产生同样影响的英译本。”原因很简单，我们不可能知道《伊利亚特》是如何“影响了它的自然听众的”。它可能仅仅意味着英语译者应该像荷马有力地影响了希腊人一样，尽力去影响其英国同胞。但是仅有这个方向还不够，因为它无法真正地引导译者。所有伟大的诗人都强有力地影响了他们的受众，但是不同诗人的影响各异：译者的任务是再现荷马史诗的效果。那些无知的英语读者，^①即使感情再充沛，也永远不可能确定译者是否再现了这个效果，抑或是创造了其他效果。于是，译者可能会再回到纽曼的观点，即努力做到“忠实”，努力“保存原作的每一个特别之处”。但是，在他按照纽曼的引导去忠实翻译的时候，或在纽曼忠实翻译的时候，谁能够确信他们严格遵循了荷马的风格和思想习惯呢？很显然，译者需要更多的实际性的指导。虽然没有人能告诉译者荷马到底怎样影响了希腊人，但却有人能告诉译者荷马如何影响了他们。这些人就是学者，他们熟悉希腊，同时又拥有足够的诗味和诗性。在他们眼里，几乎没有译作能和原作媲美，不过他们却能够判断译作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是否与原作相同。他们是唯一能够胜任此任的评判者：因为古希腊人已死，无知的英国人没有评判的依据，人又不能够完全依赖自我评价。所以，译者不要去想古希腊人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译文，否则他会越发迷失；译者也不要去想普通的英国读者会如何看待自己的译文，否则他会误入歧途；译者不要依靠自己对自己译文的判断，否则他会被自己的心血来潮误导。译者应该问一问自己，他的译文会如何影响那些既了解希腊又能欣赏诗歌的人；他的译文是否能让伊顿公学校长、剑桥大学的汤普森（Thompson）教授或者牛津大学的乔伊特（Jowett）教授产生和阅读原作一样的感受。我认为当本特利教授（Richard Bentley）说蒲柏的译文“非常好，

^① 此处和下面的“无知”的原文是“unlearned”。阿诺德曾批评英国人，说他们是“受教育程度最差的民族”，见 Arnold, M. (1849). Charles Kingsley, *Fraser's Magazine*. In Dawson, Carl (1973) (ed.). *Matthew Arnold: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 New York: 38.

但那是蒲柏，不是荷马”时，蒲柏译文的好坏已经显而易见，尽管他的译文引人入胜且影响很大。

“你将任命智者”（希腊语），即“由智者来决定”。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愿意将自己的作品（译作）交由智者来评判，然而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谁是“智者”这个问题，没有哪两个人的意见会完全相同。而在本例中，这种分歧将不复存在：因为译者和我一样，认为只需寻求评判者一个人的意见即可，这样一来，借着这个实际的检验就可以判断他的译作是否真的成功。那么，为了让译作能通过评判者的检验，译者该如何做呢？

首先，我要给他提一些消极的忠告。荷马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太重要，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太经典，任何走近他的人都应该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对实现他接近荷马的目标直接有益的方面，因此，我建议译者不要去涉猎以下问题：荷马其人是否真的存在？《伊利亚特》是出于一人之手还是多人之手？《伊利亚特》指的是一部史诗，还是《伊利亚特》和《阿基琉斯纪》两部史诗？^① 基督教赎罪教义是否在荷马的神话中有所暗示？勒托女神是否预示着圣母玛利亚？^②。这些问题早已经被讨论过，且不乏有学术价值以及独创性的论断。但纠结于这些问题有两个麻烦之处：一个是所有接近荷马的人都会遇到的普遍性麻烦，一个是只有译者才会遇到的麻烦。普遍性的麻烦在于，这些问题都是无解的，因为没有确凿的史料来证明。而对于译者来说，即便他搞清楚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有可能的话），对他的翻译也没有丝毫的用处。

我再次建议译者，不要为了遵守有关荷马独特风格特点的某些理论，凸显某些特征，去费力构建一个供自己翻译用的特殊的词汇表，也不要不使用某类英语词汇，或者只使用某类词汇。纽曼说，“由于荷马的语言基本上是古代的语言，因此译者应该尽量翻译成撒克逊—诺曼时期的英语，而

① 《阿基琉斯纪》是古罗马著名诗人斯塔提乌斯未完成的史诗，讲述希腊英雄阿基琉斯的生平。

② 在古希腊神话中，勒托是宙斯的配偶之一，阿波罗与阿耳忒弥斯的母亲。在神话中涉及她的部分主要讲的是她生育阿波罗的故事。

不是使用现代英语中的拉丁、希腊语的古典词汇”。不幸的是，纽曼在翻译中并未践行自己的理论，因为据我观察，他的译文中使用了很多拉丁语源的词汇，这与荷马史诗的简洁格格不入。比如，纽曼先生最喜欢使用“responsive”一词指代荷马原文的“ἀμειβόμενος”（回应道）：

Great Hector of the motley helm thus spake to her responsive.
But thus responsively to him spake god-like Alexander.

在宙斯对阿基琉斯那匹长生不老的驭马的讲话中，纽曼使用了“celestial”一词：

You, who are born celestial, from Eld and Death exempted!

“responsive”和“celestial”都是来自拉丁语的词汇，不得不说，这样的用词太过学究气，给人以不和谐的感觉。不过，撇开纽曼对自己理论的忠实度不谈，在我看来这样的理论对于译者来说是危险的，理论本身也是错误的。对于译者来说危险，是因为不管在哪里使用了这个理论，（这种情况很常见），哪里就会有学究气，而学究气是最不符合荷马特征的。理论本身的错误在于，英语清晰明快的特点大多得益于其中的拉丁语元素，因此与德语有所不同，但与希腊以及罗马地区的语言相似。因此，如果荷马的英译者只使用撒克逊时期的英语词汇，那他就失去了翻译荷马的一个语言优势。在德国诗人沃斯（Johann Heinrich Voss）的著名德译本中，虽然他也使用了六步格、也非常忠实，但正是由于德语本身笨重、冗长，使得他的译作无法产生希腊原作的效果。如果英语译者遵循了纽曼的翻译方法，那他相对于沃斯的语言优势也会丧失。

当我们走近一位作家时，我们的心思影响着我们是否能正确欣赏他。走近荷马的译者，应该存有最简单的心思。现代情绪企图将古代世界变成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如果译者能够真正感受到荷马的情绪——除非他

能够真正感受到，否则他不可能正确地翻译荷马——他就需要时刻警惕这种现代情绪，不要将这种现代情绪加诸到荷马的身上。例如，在《国家评论》的最后一期上，有一篇评论荷马英译本的文章，非常有趣。文章作者引用了评论家罗斯金（John Ruskin）对译文中的“life-giving”这一修饰语的评价。在《伊利亚特》原文第三卷，海伦^①提到她的两个兄长卡斯托耳（Castor）和波吕克斯（Pollux），她不知道他们已经死了：

ως φατο • τους δ' ἤδη κατεχεν φυσιζοος αια
εν λακεδαμονι αυθι, φιλη εν πατριδι γαιη^②.

海伦言罢，却不知孕育生命的泥壤已经把他们埋葬
在拉凯代蒙，他们热爱的故土。

罗斯金说，“诗人在讲到大地时必须悲伤，但他不能让悲伤影响或改变他的心态。没错，虽然卡斯托耳和波吕克斯已经死去，但是大地仍然是我们的母亲——它带给我们丰收、带给我们生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现代情绪，是用现代情绪代替古人情绪的一个典型案例。那些希望真正感受古人的学生们，必须要坚决地警惕这种情绪。呵，罗斯金的评论让我们想起那些现存的批评家的话：“任何作品都有自己的缺陷，虚构文学中，感情也是虚假的。读者或许会感动，但这却例证了评论中的“感情也是虚假的”。在上面那段中，荷马把大地称作“孕育生命的”，不是因为“尽管他讲到大地时带着悲伤，但他不能让这种悲伤改变或影响他的心态”，反而自我安慰说“大地仍然是我们的母亲——它带给我们丰收、带给我生命。”这种常见的评论称荷马受到这种非常现代的情绪的启发，这是不准确的。歌德说，“从荷马和画家波吕格诺图斯身上，我每天都更清晰地认识到，苍穹之下，大地之上的我们

① 海伦是斯巴达国王墨奈劳斯的妻子，是希腊神话中宙斯与勒达之女，被称为“世上最美的女人”，她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劫持，特洛伊战争即因争夺她而起。

② *Iliad*, iii, 243.